

武工队：“向敌后的敌后进军”

1942 年,在冈村宁次指挥下,日军对我华北各根据地持续进行大规模“扫荡”,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小。面对严峻形势,129 师师长刘伯承提出“变敌进我退,为敌进我进”的新作战方针,八路军总部迅即将这一口号推向全华北。“敌进我进!”“向敌后的敌后进军!”成为冲破黑暗的号角,把武工队推上了敌后抗战的历史舞台。

深入被“蚕食”地区

晋冀鲁豫根据地是较早组建敌后武工队的地区之一。当时,刘伯承、邓小平在给冀南军区的指示中,要求依照指示组建武工队深入敌后开展工作,规定“50 人为一队,以营特派员为队长,好的县委书记或委员为政委、书记,都能懂得政策”。

根据指示,各部队挑选军政素质好、战斗经验丰富的干部作为骨干先行集训,主要内容是明确武工队的组织形式和任务,了解研究敌情、社情、民情,演练战术,制订行动计划。培训出来一批批骨干后,再分派下去组建武工队。

刘伯承、邓小平多次深入集训队指导,讲形势,讲任务,讲意义。刘伯承还讲授各种战术,如“战术一般采取避实击虚的奔袭动作,使得敌人措手不及”;“小敌可捕捉击杀,大敌则避开”;“当敌人来合击时,以麻雀战分遣撤退,但预先应确定第一、第二集合场,便于收拢部队”,等等。

不久,晋冀鲁豫所属太行、太岳、冀南 3 个军区就派出了 42 支武工队,约 1400 人。其中冀南第一分区的 3 支

武工队,队长、政委都是团级干部,队员都是连排长、连指导员或支部书记。

同一时期,其他各根据地武工队也蓬勃发展,至 1943 年,整个华北敌后的武工队活动达到了高峰。晋察冀军区以地方部队的全部和主力部队的 1/3 或 1/2,组成几十支武工队深入敌后广泛开展对敌斗争。山东军区抽调 600 多名干部组成 43 支武工队深入铁路沿线和被“蚕食”地区打击敌人。晋绥军区抽调 320 多名干部加强武工队,组建 37 支武工队深入敌后,并派出 39 个主力连和 49 支游击队,配合武工队斗争。

神出鬼没痛击敌人

晋冀鲁豫所属冀南军区武工队成立几个月内,先后消灭了恩县旧城区特务队,镇压了巨鹿警备大队长、情报主任、南和伪军大队长等,抓捕了 22 名汉奸并处决了其中 8 名罪大恶极者。经过一年战斗,太行、太岳和冀南等根据地,由武工队和小部队恢复和扩大的面积,约占全年恢复和发展总面积的 3/5。

晋察冀军区所属冀中军区将连队改为小连大班制,执行武工队任务。如今家喻户晓的白洋淀雁翎队就诞生在冀中。他们以河川、湖泊、芦苇、草荡为掩护,神出鬼没痛击敌人,仅王寨一场战斗,就歼灭日伪军 50 多人,截获满载粮食物资的大船几十艘。1943 年全年,冀中军民共攻克敌碉堡 600 多座,恢复和扩大了 3500 多个村庄,使许多小根据地连成一片。

山东军区 1943 年共拔除 342 个据点,开辟 7000 多个村庄,惩处了一

批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。如今无人不知的铁道游击队,正是武工队中的佼佼者。他们活跃在铁道沿线,破铁路,炸火车,夺取军用物资支援根据地,给枣庄、滕县的敌人造成了严重威胁。

据点屡屡被拔除的惨状,令冈村宁次终生不忘。多年后,他在回忆录中还讲述了一个他当年记录下来的八路军假扮送葬队伍,攻克日军 1 座碉堡并全歼守军的战例。

在武工队的袭扰打击下,日伪军炮楼据点安全不保,被迫不断撤退,使武工队控制的小块根据地越来越多,这些小块地域逐渐被打通,恢复和扩展为大片根据地。正如彭德怀所说:“武工队在一个地区活动得久了,在老百姓中间生了根,就创造了隐蔽的根据地,把敌人占领的土地,再从敌人口中挖出来。”

瓦解敌军工作硕果累累

此外,武工队在敌后各地瓦解敌军工作也硕果累累,这里仅以晋冀鲁豫为例。据 129 师参谋长李达回忆,该部发动了针对伪军的“良心大检查”和“检举死心汉奸”运动等大规模政治攻势。武工队经常晚上给伪军“上夜课”,用话筒向据点里的伪军喊话宣传。久而久之,伪军们一听武工队来“上夜课”就集中起来听,还对武工队喊:“同志们上课离得再近一点吧,听得清楚,我们保证不打枪。”仅 1943 年 12 月的一天晚上,一个军分区的武工队就向该区境内 200 多个据点同时喊话,声势之浩大可见一斑。有的武工队发明了“点红黑点”的办法,做好事点红点,

做恶事点黑点,凭此秋后算账。伪属们得知后,纷纷打听自家人是否被点了黑点。有的武工队给帮助抗日的伪军颁发“回心证”“公民证”,鼓励他们持续向善。

在强大的政治心理攻势面前,伪军们都在思考抗战胜利后怎么办的問題。有一个伪军县警备队,500 多人当中有 200 多人领了“回心证”;有的伪军不慎弄丢了“回心证”,赶紧找武工队补办,生怕被当作汉奸锄了;有的伪军被迫参加“扫荡”时,暗中把“公民证”挂在枪口上,交火时枪口朝天或一枪不放。有些伪军暗中送情报,有些协助据点,有些秘密入党,有些起义投诚。到 1942 年 12 月,仅冀南军区就在伪军和伪组织中建立了 1397 个“内线”。1943 年前 4 个月,该军区依靠“内线”配合军事行动 177 次,拔除据点 109 处。

同时,针对日军的瓦解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。武工队通过散发传单、张贴反战标语、樱花节赠送宣传慰问袋、阵前喊话等方式进行反战教育,对日军士兵产生很大影响,各地普遍成立了日军士兵反战同盟支部。晋冀鲁豫军区还召开了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反战同盟大会,刘伯承和边区主要领导亲自与会讲话。越来越多的日军士兵向我方投诚,有些写信表达厌战反战思想,有些装病不参加“扫荡”。

多年以后,八路军各部队战史和各级将领的抗战回忆,无不对武工队赞美有加。其横空出世、威震敌胆的光辉历程,成为华北敌后乃至全民族抗战的一个标志和缩影。

据《党史博览》 郭尚睿/文

朱自清学英语

1931 年,朱自清在清华大学执教满五年,按照清华的规定,可以获得休假一年的机会。他决定到英国访学,以弥补没有留学经历的缺憾。

8 月 22 日,朱自清从北平启程,9 月 8 日抵达伦敦。在最初的一个月里,语言是其最大的困扰,9 月 11 日,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谈到自己遇到的一次不公正待遇:“8 日从巴黎到伦敦,中途要验护照并须验身体,别国人无须验,只验我,甚为可恨!”他还写下“甚以为耻”四字。对于无法张口与人抗辩,他写道:“余英语不济事,愧煞!”他还在信中谈到自己学习英语的计划:“我想在二三个月内加油学习英语英文。我的英文实在不行。”

到伦敦不久,朱自清就搬了几次家,希望遇上喜欢谈话的房东,可以有更多练习口语的机会。不久,得益于口语的进步,他在自己权益受损时能够大胆“维权”:“高尔街上快捷奶制品店的女招待弄得我很尴尬。我去要求她更正收据上的数字。”日记中也记录了他用错词而闹笑话的趣事:“我错误地用‘猪肉’这个英文词去代替‘猪’一词,引起一阵哄堂大笑,我感到非常丢脸。”

1931 年 10 月开始,朱自清到伦敦大学上课。初入校园,他在课堂上和课余听演讲时,理解起来多有隔膜。由于读书缓慢,初期日记中他常常流露“对自己的进步不快感到失望”“全不明白,真不知如何办法”之类的悲观沮丧情绪。他开始探索更

有效的学习方法。为了“将读写培养至相当能力”,他自 1931 年 11 月 4 日开始用英文写日记,而且叙事极尽详备,几乎巨细无遗,这一时期的日记也成为他全部日记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分。

朱自清“每天朗读替换词汇表和语音练习读本”,针对会话课上“说话不流利”,他认识到主要原因在听力不足,并在 11 月 13 日的日记中反思道:“我觉得自己的主要问题不在于说,而是在于听。我的耳朵太迟钝,大概不适于学音乐和外语,特别是人到了中年更难学。”

此后,为了提高自己的听力,他又日日早起专门进行听力练习。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,慢慢有了成效,从其十天之后的日记中就可看出端倪:“当老师的课快要开始时,我的作文还没完成。听课时几乎心不在焉,不过我还是听懂了大部分内容。”

随着语言能力的全面进步,朱自清与外国朋友的交往越来越多,越来越轻松自如,在英语文学、文艺理论方面的钻研也越来越深入。然而,他并没有放松语言学习。从 1932 年 1 月 12 日开始,他正式到雨果语言学院参加私教课程。但不久他就发觉老师的发音并不地道,就向学院反映情况,要求更换老师,而第二任老师在他看来也是个“能力平常的人”。显然,随着他语言判断鉴别力的提升,对老师的期待与要求也“水涨船高”了。

据《名人传记》 徐月/文

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

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力量

勤劳人 吉祥人



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陕西卫视 王乃良作